

藏经洞珍品卷

赠阅卷

敦煌石窟艺术全集



弘路書

藏

经

洞

珍

品

卷

敦煌石窟艺术全集赠阅卷

本卷主编

樊锦诗

副主编

罗华庆

敦煌研究院主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敦煌石窟艺术全集·藏经洞珍品卷/敦煌研究院主编. —上海：同济大学出版社，2016.1
ISBN 978-7-5608-6015-2

I. ①敦… II. ①敦… III. ①敦煌石窟 - 画册 IV. ①K879.2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24665 号

本全集由商务印书馆（香港）有限公司授权独家简体版权，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

同济大学出版社 联合策划出品
上海福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总策划 王国伟 姚建中

出版人 支文军

项目成员 赵泽毓 那泽民 张睿 丁会欣 熊磊丽 蒋文卓

敦煌石窟艺术全集·藏经洞珍品卷（赠阅卷）

主 编 樊锦诗

副 主 编 罗华庆

责任编辑 那泽民

责任校对 张德胜

封面设计 那泽民 陈益平

设 计 吕敬人

出 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

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

<http://www.tongji.com.cn>

制 版 中华商务（香港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印 刷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08-6015-2

目 录

前 言 藏经洞引发的敦煌学	005
第一章 藏经洞的秘密与劫难	009
第二章 百科全书式的藏经洞文献	021
第三章 敦煌艺术鼎盛时期的绘画	039
 附录：世界各地收藏藏经洞文物地点概览	093
图版索引	094
藏经洞位置图	094
敦煌历史年表	095

敦
煌
石
窟
艺
术
全
集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敦煌石窟艺术全集·藏经洞珍品卷/敦煌研究院主编. —上海: 同济大学出版社, 2016.1
ISBN 978-7-5608-6015-2

I. ①敦… II. ①敦… III. ①敦煌石窟 - 画册 IV. ①K879.2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24665 号

本全集由商务印书馆（香港）有限公司授权独家简体版权，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

同济大学出版社 联合策划出品
上海福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总策划 王国伟 姚建中

出版人 支文军

项目成员 赵泽毓 那泽民 张睿 丁会欣 熊磊丽 蒋文卓

敦煌石窟艺术全集·藏经洞珍品卷（赠阅卷）

主 编 燮锦诗

副主编 罗华庆

责任编辑 那泽民

责任校对 张德胜

封面设计 那泽民 陈益平

设 计 吕敬人

出 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

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

<http://www.tongji.com.cn>

制 版 中华商务（香港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印 刷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08-6015-2

藏

经

洞

珍

品

卷

敦 煌 研 究 院 主 编

石 窟 艺 术 全 集 赠 阅 卷

本卷主编

樊锦诗

副主编

罗华庆

敦煌石窟艺术全集

主编单位 敦煌研究院

主 编 段文杰

副 主 编 樊锦诗(常务)

编著委员会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主 任 段文杰 樊锦诗(常务)

委 员 吴 健 施萍婷 马 德 梁尉英 赵声良

出版顾问 金冲及 宋木文 张文彬 刘 畅 谢辰生
罗哲文 王去非 金维诺 周绍良 马世长

出版委员会

主 任 彭卿云 沈 竹 刘 炜(常务)

委 员 樊锦诗 龙文善 黄文昆 田 村

总 摄 影 吴 健

艺术监督 田 村

藏经洞珍品卷

主 编 樊锦诗

副 主 编 罗华庆

摄 影 盛葵海

前 言

藏经洞引发的敦煌学

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（1900年6月22日），这是为敦煌带来辉煌与劫难的日子。住在敦煌莫高窟下寺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石窟内的积沙时，偶然发现了一个封闭800多年的密室，大批中世纪的稀世珍宝重见天日。这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，使敦煌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。

藏经洞被打开时的情景，20世纪40年代初到敦煌的谢稚柳先生在《敦煌艺术叙录》中记载了这一时刻：“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，则内有一门，高不足容一人，泥块封塞。更发泥块，则为一小洞，约丈余大。有白布包等无数，充塞其中。装置极整齐，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。复有佛帧、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之下。”

藏经洞封存了4至11世纪初的文献、绢画、纸画、法器等各类文物，约计5万件，5千余种。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宗教文书，非宗教文书占百分之十。后者的内容包括官私文书、四部书、社会经济文书、星图、云图、文学作品、启蒙读物。文书除汉语写本外，还有古藏文、于阗文、梵文、回鹘文、粟特文、突厥文、龟兹文等写本。此外还有一批木版画、绢画、麻布画、粉本、丝织品、剪纸等作品。这些来自丝绸之路的中世纪珍宝，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、地理、宗教、经济、政治、民族、语言、文学、艺术、科技等提供了数量巨大、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，被誉为“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”、“古代学术的海洋”。与殷墟甲骨文、汉简、明清档案，被誉为中国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，学术价值于此可见。

藏经洞发现以来，从最初对敦煌出土文献研究开始，逐渐扩展至对敦煌石窟、敦煌史地，甚至丝绸之路沿线的出土文物的研究，从而

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——敦煌学。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《敦煌劫余录序》中说：“敦煌学者，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。自发见以来，二十余年间，东起日本，西迄法英，诸国学人，各就其治学范围，先后咸有所贡献。”由于敦煌资料丰富的内容和价值，引起了中外大批学者的注意，并给予了充分的研究和探索，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。

敦煌学内容异常丰富多彩，它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的作用，概括起来有几个方面：首先，为中国历史、地理的研究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，甚至填补了某些空白，如唐末敦煌地区的民族文化交流，政治、经济及社会制度等情况，藏经洞就发现了一些唐代地理佚书，对研究中古史地有重要价值。第二，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发展，发现了一批新的文学史资料，新的文学体裁。通俗文学历来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，敦煌文献中的大批资料，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新的课题。第三，敦煌对于艺术史和考古学研究，更是意义非常。敦煌的绘画、雕塑、建筑、书法、音乐、舞蹈，从六朝一直到宋、元，数量之大，内容之丰富，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处古代遗存。从题材上看，有佛经故事，也有世俗内容，反映的人物、事物多种多样，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多学科的研究者，都能从这里找到重要的资料。第四，敦煌石窟中保存了一些中国语言学、音韵学的古籍，对研究中国文字、语言发展和演变有重要作用。第五，敦煌是宗教研究的宝库，除了数量最多的佛教资料外，还有曾经一度流行但现在已绝迹的宗教如摩尼教、火祆教的典籍，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。第六，对古代科技研究的价值，诸如造纸、装潢、印刷、天文历算、医

学、交通运输等等。第七，敦煌正处东西文化交流的通道，留下了大量文化交融的痕迹，它是参与者，亦是见证者，做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，敦煌是不可或缺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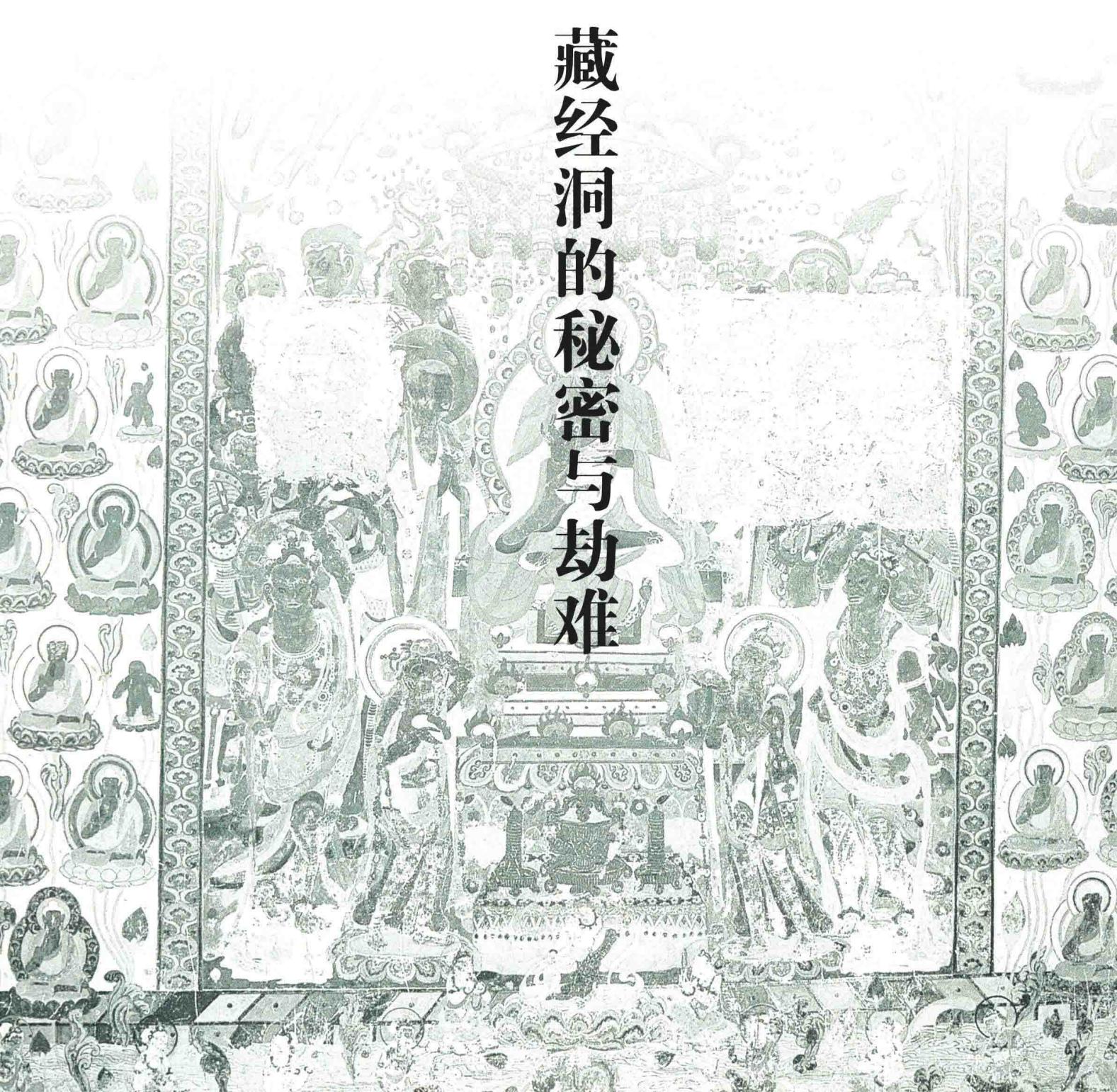
敦煌作为中国、印度、希腊、伊斯兰这世界四大文化的交汇点，研究、探索文化汇流现象和规律，条件比其他地区更为有利，藏经洞文物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。长期以来，藏经洞文物散布世界各地，中外学者的研究，多为分散地进行，缺乏全面、系统地交流。相信随着更为广泛的学术交流，在中外学者不断深入的揭示和解读下，将逐步揭开藏经洞的全部秘密。

目 录

前 言 藏经洞引发的敦煌学	005
第一章 藏经洞的秘密与劫难	009
第二章 百科全书式的藏经洞文献	021
第三章 敦煌艺术鼎盛时期的绘画	039
附录：世界各地收藏藏经洞文物地点概览	093
图版索引	094
藏经洞位置图	094
敦煌历史年表	095

第一章

藏经洞的秘密与劫难



在莫高窟密如蜂巢的洞窟中，开凿于晚唐的第16窟是一个大型的覆斗形洞窟，是河西都僧统洪誓于唐大中五年至咸通八年（851—867年）开凿的。在甬道的北壁内还开凿了窟主洪誓的纪念性影窟，即第17窟，平面约呈方形，南北长2.83至2.84米，东西宽2.74至2.75米，面积约7.8平方米。窟顶也为覆斗形，高约0.5米。北面置一长方形禅床，上置高僧洪誓的塑像一身。北壁绘壁画一铺，内容是：两棵枝叶相交的菩提树，树枝上挂净水瓶、挎袋各一，壁画与塑像组成了洪誓在菩提树下坐禅的意境。菩提树东一比丘尼手持对凤团扇，树西侧一近侍女手持执杖。西壁嵌有洪誓告身敕牒碑一通，记载了造窟的历史。学者研究证实，此窟的石碑、雕塑和绘画都与开窟人洪誓信奉佛法和生活场景相关，是为纪念洪誓而作。大约在11世纪中叶，莫高窟三界寺的僧人将洪誓像迁移出去，把该寺多年收藏的5万多件珍品密藏在这间斗室，又砌墙封闭窟门，还在墙壁上绘饰壁画，遮掩痕迹，从此珍品被尘封了800年。由于窟中所藏珍宝大部分为佛教经典，所以被称为藏经洞。

洪誓的影窟为什么变成藏经洞？什么人封闭了藏经洞？这是国内外学者几十年来探索的秘密，众说纷纭。目前有诸多封闭洞窟的假设，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，一是战乱避难说，二是石窟废弃说。持避难说的伯希和（Poul Pelliot, 1878—1945年）、罗振玉等，根据窟内的各种卷本、画幅、法器等放置凌乱无章，认为在1035年西夏人掠夺敦煌时，莫高窟佛僧“仓促窖藏书画，寇至僧歼，后遂无知窖处者”；白滨推测，在1014年曹贤顺继任归义军节度使期间，为了防备战争危及瓜州、沙州，敦煌寺院中进行备战，莫高窟密封藏经洞源于此时；殷晴提出黑韩王朝威胁说。黑韩王朝信奉伊斯兰教，毁灭佛教，北宋绍圣年间（1094—1098年）黑韩王朝请求攻打信奉佛教的西夏，得到宋朝的赞许，敦煌莫高窟佛僧闻讯而密藏经书。荣新江也持此说，他认为事件发生在1006年，黑韩王朝攻灭信奉佛教的于阗国。由于于阗与沙州政权有姻亲关系，于阗国王曾经请求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援助抗击黑韩入侵。当于阗覆灭后，大批于阗难民东逃沙州，在战争乌

云密布的恐怖气氛中，三界寺的僧人把多年收藏的佛经、文书等重要物件密藏于洪誓影堂，然后封闭窟门，又绘制壁画，做到天衣无缝。因此密藏是在井然有序的情况下进行的。以后当事人离开人世，藏经洞被遗忘了。此外还有诸多避难说的假设，例如13世纪的元初，佛僧为了躲避蒙古军队西进的战乱；14世纪，佛僧为了躲避元末明初的兵乱等。

石窟废弃说首先是英国人斯坦因（Marc Aurel Stein, 1862—1943年）提出，他根据藏经洞内保存了相当数量的汉文碎纸，多是残卷断篇，还有绢画残片，而没有收藏整部佛经，因此推断藏经洞是堆放废弃物的场所。日本藤枝晃提出，公元1000年左右中原印版佛经大量传入沙州，原有的手写本佛经变成了“神圣的废物”被弃置封藏，年久被人淡忘了。以后方广锠进一步探究，他根据在藏经洞中没有发现一部完整的大藏经和金银字大藏经，因此推测11世纪的曹氏归义军统治时期的某一天，敦煌各大寺院进行一次藏书大清点，莫高窟三界寺的僧人将大批无用的经卷、文书、废纸和多余的法器封藏于藏经洞内。

以上诸多假设，至今仍是敦煌学研究的热点话题。

藏经洞密藏珍宝的意外发现，“见者惊为奇观，闻者传为神物”。然而它也给敦煌带来一场空前的劫难。

藏经洞的发现者王圆箓，是湖北麻城人，道号法真。清光绪年间，流寓莫高窟，居住在下寺。藏经洞文物发现后，王道士并没有认识到文物的珍贵价值，而将它作为巴结官吏的礼品，此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敦煌县令汪宗翰就地“检点经卷画像”再次封存，并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，不许外流。不幸的是，在中国晚清政府腐败、西方列强入侵的历史背景下，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，绝大部分流散到世界各地，仅有少部分保存于中国，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。陈寅恪先生因此而慨叹：“敦煌者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！”

最早来到敦煌藏经洞的是斯坦因。他于1907年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时，

来到莫高窟，拍摄了石窟壁画，并利用王道士的无知，廉价购走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24箱，绢画和丝织品等5箱，其旅行记《沙漠契丹废址记》（*Ruins of Desert Cathay*, 1912年）中，详细记录了在敦煌活动的经过。第三次探险（1913~1915年）时，重访莫高窟，又从王道士手中获得570余件敦煌写本。斯坦因二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，总数约两万余件，现主要收藏在英国和印度的博物馆、图书馆中。

接踵而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，他1908年来到莫高窟。因能操汉语，熟悉中国古典文献，他将藏经洞遗物全部翻阅一遍后，廉价购买了佛教大藏经未收的文献、带有题记的文献和非汉语文献，以及斯坦因所遗的绢画、丝织品等，总数约一万余件，现藏法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中。1909年，伯希和将敦煌写本精品携至北京，中国学者罗振玉、蒋斧、王仁俊、董康等人看后，

“惊喜欲狂，如在梦寐”，得知敦煌藏经洞尚有部分劫余，便以清学部的名义致电陕甘总督封存藏经洞内劫余古物，严禁外运。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清学部咨甘肃藩司，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，但在起运前王道士又转移藏匿了许多文书。在运京途中被各地官吏窃取、遗失无数。进京后又遭官员何震彝、李盛铎等人藏掖、偷盗，将经卷中精好者悉数窃取，而将余卷一折为二，以充其数，当移交京师图书馆时共为18箱，后经整理计有8697号。

随后，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大谷光瑞，于1911年至1912年派遣橘瑞超、吉川小一郎去敦煌，从王道士手中购得窃藏的敦煌文献400余件。俄国人奥登堡（1863~1934年）在1914年考察敦煌时，从敦煌居民手中收购了300余件文献，并发掘部分洞窟的堆积物，获得大量写本、壁画残片、绢画、麻布画、纸画以及丝织品等。1924年，由华尔纳（Langdon Warner, 1881~1955年）率领的美国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姗姗来迟，面对空无一物的藏经洞，不甘心空手而归，竟用涂有黏着剂的胶布片，将10余幅唐代壁画精品剥离，连同一尊唐代供养菩萨塑像掠至美国，使敦煌壁画遭到严重的破坏！

经此劫难，藏经洞最初发现时的原貌没有一份详细而科学的记录和目录，珍品的确切数量也众说不一。在诸多记载藏经洞发现的出版物中，仅有斯坦因《西域考古图记》和谢稚柳《敦煌艺术叙录》对藏经洞最初发现时文物堆放的现状有所描述，但又均无数量的记载。流失到国内外的三万多件文物，其过程复杂而隐秘，更无明确数量记录。此外，各国的收藏机构登录和统计方法各不相同，所收资料无法全面公布，因此，至今没有一份正式的藏经洞文献的完整目录。以藏经洞发现为肇端，及藏经洞文物流入西方，引发对莫高窟和敦煌地区石窟的世界性研究热潮，一百多年来经久不衰。